

# 從蒐藏行動到公共展示： 博物館與日本客家社群的能動性

羅曉嵐\*

## 摘要

本文以博物館民族誌為方法，探討日本客家社群在文化逐漸流失且缺乏官方制度支持的情況下，如何透過尋求公共空間展開文化實踐，以維繫文化韌性。本研究聚焦於日本客家崇正會參與博物館的過程，分析其在蒐藏與展示的協商機制中，如何展現文化能動性，以回應文化流失與制度缺席的挑戰。

文章指出，周子秋作為推動日本客家社群行動的關鍵引導者，透過蒐藏與展示活動，使散佚於日本各地的客家文物陸續納入博物館體系保存；並在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合作策劃展覽期間，促成社群成員共同參與自身歷史與文化的書寫，進而影響民博的蒐藏與敘事策略，納入更多關於日本客家崇正會的資料與觀點。

本研究認為，日本客家社群雖然缺乏制度支持，仍能靈活回應多元需求，創造保存與再現文化的契機，並推動社群內部對文化表述方式的探索與實踐，從而強化群體的認同與連結。此一研究不僅深化了對海外客家文化延續機制的理解，也揭示了博物館在社群參與與知識生產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 關鍵詞

日本客家、行動者、文化實踐、社群能動性、博物館民族誌

---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博士候選人。

# From Community Collecting to Public Exhibition : The Agency of Museums and the Hakka Community in Japan

Siao-Lan Lo\*

##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a museum ethnography approach to examine how the Hakka community in Japan, amid ongoing cultural erosion and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seeks to sustain cultural resilience through practices enacted in public spaces. By focusing on the Tsung Tsin Association of Japan and its involvement in museum initiatives, the study analyzes how cultural agency is articulated through negotiation processes surrounding collection and exhibi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cultural loss and institutional neglect.

Focusing on Zhou Ziqiu as a key community actor, this paper highlights how, under his initiative, scattered Hakka artifacts across Japan have been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museum system for preservation. During the collaborative exhibition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Minpaku), Zhou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uratorial planning and object interpretation, fostering community-led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public dialogue. This collaboration also prompted Minpaku to adjust its collection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by incorporating more materials and perspectives related to the Japanese Hakka Tsung Tsin Associatio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despite the absence of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the Japanese Hakka community has exhibited notable adaptability in responding to diverse needs—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while fostering internal processes of exploration and enactment of cultural expression. These practices have contributed to a strengthened sense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ohesion. By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sustaining Hakka cultural continuity in the diaspora, this research also highlights the pivotal role of museums as spaces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 Keywords

Hakka in Japan, actors, cultural practices, community agency, museum ethnography

---

\*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一、前言

客家人因遷移特性足跡遍布全球。然而，相較於其他地區，臺灣因其特殊的歷史脈絡與族群政策，成為全球唯一設有官方機構專責推動客家事務的國家。不僅在文化保存、語言復振與族群認同建構方面取得顯著成果，也形成一套制度化的文化治理模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外少數客家社群在缺乏穩定資源挹注與制度性支持的情況下，往往難以主導自身文化的保存工作，文化延續的責任遂轉向社群內部的情感動員與自發實踐。

筆者自2024年9月5日參加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民博」）舉行的特展「客家與日本：海外華人編織的另一部東亞關係史」（以下簡稱客家與日本）。開幕式上，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會長周子秋發表的一席話，深深地打動筆者：

這次有這個機會，我想趁著情緒還很真實、很激動的時候，講幾句心裡話。這次活動結束之後……其實我們自己，也只是站在很卑微的立場上。很多事情，真的，不知道的人就是不知道…所以我們決定，把這次展出的所有東西，全部捐給民博。接下來，我想拜託大家一件事。這份心意、這份感情——能不能請你們幫我們留下一個見證？希望這個「客家展示區」能夠被長久保留下來，永久地存在下去。真的、真的非常拜託你們了。

儘管當時尚無法領會這份請託背後的深意，但肯定的是若非滿懷真摯，又怎能期望為期僅三個月的展覽能夠長久被保存下來呢？可見這份期待不只是對展覽的願景，更反映了對客家文化能否持續延續的深切關懷。

在此背景下，筆者關注臺灣以外的客家人，如何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況下，尋求公共表述的空間，並透過文化實踐維持其文化韌性。為此，本研究以日本客家崇正會參與博物館的過程作為觀察場域，探討海外客家人如何透過蒐藏與展示建構並再現自身文化，進而凸顯少數群體在公共文化空間中的能動性，也為博物館與相關文化機構提供更具包容性與多元性的參照視角。

本研究採用博物館民族誌（museum ethnography）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其奠基於人類學民族誌之基礎，以博物館作為主要的田野場域。王嵩山（1992：76）指出：

「傳統的民族誌是通過田野工作從內部來描述事件和習俗（文化）的過程；博物館民族誌需要對於普同與特殊的人性、文化和知識的性質，有完整而深入的掌握，也需要與時俱進的從事原創與累積的調查研究，其不只停留在溝通媒體轉換的層面，更進一步的整合研究者的理念、標本器物、文獻、教材、展示設計和教育活動，整體而多重地交織並傳遞有關人和文化的知識」。

因此通過博物館民族誌，可進一步揭示博物館作為文化再現場域的運作機制與社會關係。

筆者於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3 月於日本，展開為期約 7 個多月的田野調查，場域涵蓋大阪的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及分布於關東與關西地區的日本客家崇正會。調查內容除記錄展覽的展出過程外，亦以參與者身分積極投入相關延伸活動，如導覽、講座與社團聚會等，以掌握客家社群在展示實踐中的動態參與情形與文化表述方式。對於已結束、無法現場觀察之展覽，筆者則蒐集相關歷史資料並進行訪談，以重建其內容與脈絡。訪談對象包括展覽策展人、日本客家崇正會成員等，藉此理解他們對展示內容、文化意涵與認同建構的詮釋與期待。

## 二、博物館作為文化實踐場域的意義

博物館不僅是物件的收藏與展示空間，更是承載與形塑文化意義的重要場域。對少數、邊緣群體而言，參與博物館不僅是文化實踐成果的展現，更是相關成員投入、互動與自我表述的過程。透過文物蒐藏、展覽策劃、敘事建構與觀眾交流等，博物館成為文化實踐的動態空間，能在不同層面回應社群的情感需求、權力關係與歷史記憶。因此，理解博物館在文化實踐上的意義，有助於揭示文化認同再建構與文化再現中的多重角色。本節所援引的理論觀點，旨在提供當代博物館作為文化實踐場域的背景脈絡，並提供理解社群參與博物館所蘊含之多重意涵之參照。

### （一）情感連結與認同建構

根據 Nora（2012）的觀點，「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émoire）既是物質的、象徵的也是功能性的，三種意義同時存在，只是程度各異。博物館雖然在表面上為一種純屬物質性的場域，然而當展覽聚焦於特定議題，特別是那些與個人生命經驗或集體記憶相連的主題時，即可賦予該空間更深層的象徵意涵與情感價值。此種再詮釋的場域，往往轉化為一種具儀式性的文化實踐，使觀眾與展覽內容建立情感連結並產生共鳴。因此，這種情感連結不僅加深了社群對展覽的歸屬感，也促使文化再現的敘事得以延伸至展覽之外，成為不同世代與群體對話的重要契機。

## （二）文化再現與權力協商

博物館作為知識與權力交織的場域，往往再現主流社會的敘事，從而忽略甚至排除少數與邊緣群體的聲音。然而，當展示被視為一種短期且具彈性的實踐形式時，其流動性與開放性不僅能開啟對抗單一官方敘事的空間，也可能在主流話語中扮演轉化的角色，進一步調和或重構權力的運作機制。對於處於邊緣位置的群體而言，展示不僅是身份與歷史記憶的表達，更是一個與主流敘事展開對話、爭奪文化話語權的重要平臺。同時，官方機構亦可透過展示少數與邊緣群體的文化經驗，實踐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回應當代博物館對社會包容與文化多樣性的期待。展示因此成為一種協商的空間，既能挑戰既有秩序，也能重新配置文化的象徵位置。

## （三）作為參與及見證的場域

在後殖民批判的脈絡中，博物館開始反思知識建構的權力機制，並從單純物件的保存轉向對人文的關懷，重新定位自身作為社會實踐的場域。在此背景下，博物館通過與地方社群的合作，鼓勵其參與展覽設計與策劃，讓個人與社群能夠參與歷史記憶的保存、再現及詮釋，從而不斷拓展博物館在社會中的功能與角色，使之成為反映多元經驗與集體聲音的公共場域。同時觀眾的貢獻亦使文化機構所呈現的內容更具個人性與多樣性，不僅肯定了其知識與能力，也讓其他觀眾得以接觸到館方無法單獨創造的內容（Simon 2010：6）。因此，當特展作為社群共同參與製作的成果時，往往承載著「我們的歷史」的象徵意義，觀眾對展覽也會產生更深的情感連結與擁有感，進而提升其對展覽保存與延續的期待與訴求。

## （四）集體記憶的重構與協商

博物館猶如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其功能不僅在於保存與再現過去，更透過展覽的策劃、詮釋及觀眾互動，提供群體記憶共享、比較與重構的運作機制。<sup>1</sup> 因此針對特定主題的展覽，可使集體記憶得以重構與想像，特別如 Macdonald, (2009：1) 所謂的困難遺產（difficult heritage），往往涉及「哪些過去應當被記憶、哪些過去具有意義」，各種不同的群體也積極爭取透過認定與展示「他們的」遺產，以確保自身能被公共所看見與認可。因此展覽不只是記錄歷史的工具，更是記憶政治的實踐場域，涉及對歷史敘事權與文化再現的再協商。此類的展覽往往而成為社群在文化與政治層面進行記憶再建構的重要實踐場域，而激發觀眾對其延續與保存的訴求。

<sup>1</sup> 本文所稱「集體記憶」，係指 Halbwachs (1992) 所提出的概念，即記憶並非個人獨立運作，而是在「社會框架」（cadres sociaux）中透過群體互動被建構與維繫。

通過上述多個層面的回顧可以注意到，儘管博物館特展的展出時間有限，但若激發參與者的情感共鳴與文化認同，其所產生的影響並不會隨著展覽的結束而消失；相反地，更可能成為推動多元文化再現與促進公共辯證的對話平臺。由此可知，周氏請託特展長久保留的期望，並非單純的想像，而是根植於其參與過程中，對客家文化延續的責任感與行動意識；此一實踐歷程不僅展現文化再現的政治性與詩意性，也為理解博物館作為文化實踐場域提供切入視角。以下將回顧日本客家崇正會的歷史脈絡，進一步探究其參與博物館的契機與文化實踐的歷程。

### 三、日本客家社群與崇正組織

「客家」是為當代客家人群在面對外部人群時的自稱，通常被視為一群擁有共同語言、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歷史記憶與特定生活經驗的一群人；但此一稱謂實際上是為一種「標記」，源於自遠方而來的異鄉移民的他稱，經西方傳教士以羅馬字拼音鑄造 Hakka 一詞後，才開始不斷地向客地、客鄉的民間社會滲透（施添福 2014），亦逐漸將「標記」內化為群體內部的一種象徵性符號，隨著對主體性與身份認同的追求，發展成為今日所見之「客家」概念。由於「客家」的出現、蛻變與傳播深受其移動過程中面對不同境遇之形塑，以及不同脈絡下對於親屬血緣、文化淵源與主體認同的想像，亦展現出顯著的異質性與重構性，故本文採用「客家社群」（Hakka community）作為對日本境內客家人群的稱呼。

接下來將通過前人的研究，回顧客家社群遷居日本的脈絡，並探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崇正組織，其成立背景與發展歷程，最後簡述該社團近年來所推動的傳承與文化實踐活動。

#### （一）日本客家社群

欲瞭解日本客家社群的形貌，必須回溯客家相關的研究內容著手。儘管早於 19 世紀便已出現零星記載，但這些紀錄多鑲嵌在殖民體制的知識生產框架，著眼於語言分類、風俗描繪與人種特徵的界定；隨著 20 世紀民族國家的建構與身份認同的興起，原本被邊緣化的群體逐漸受到關注，才開始出現以「客家」為主體觀點出發的自我書寫與學術研究。然而，這些研究大多聚焦在中國境內的客家原鄉，以及臺灣與東南亞等地的客家移民社會，關於在日本發展的客家社群之研究卻付之闕如。有學者指出，這主要是受到日本客家人數過少與資料取得困難等因素所限制。

潘美玲等（2015）日本客家移民與人口的分析，試圖引用日本及中華民國政府關於華人／華僑之相關人口統計資料進行研究，但由於缺乏語言、幫群等指標，

故難以取得日本客家人口的精確數字，目前僅能仰賴日本客家社團領袖以會員人數為基礎所做的推估。據此類非官方且不完全的統計，日本客家人口約為 4 千到 2 萬人左右，僅佔日本總人口的 0.003% 至 0.016%，<sup>2</sup> 顯示客家社群在日本屬於分散的微小族群，故較不受到學者們的青睞。<sup>3</sup> 尤其日本不同於中國和東南亞等地，並不存在主要由客家人居住的客家村；且客家人通常不住在中華街，而是融入日本人的住宅公寓或獨棟房屋，分散居住在各地，故必須透過客家團體等連結點彼此連繫（飯島典子等 2021：75）。換句話說，由於客家人零星分布在日本各地區，難以透過聚落形態來辨識社群內部的形貌，因此日本客家團體（主要為崇正組織）的活動資料，便成為研究日本客家社群的重要參照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研究者觀察到，日本的客家人主要來自臺灣。如飯島典子等（2021：75）指出組織客家團體進行活動的客家人，大多數是來自臺灣的移民；張維安（2015：10）亦明確指出，日本的客家人大部分是從臺灣移出的。事實上，此一論述確有其依據，河合洋尚（2015：125）提到若要調查日本客家人的原籍，最有效的還是調查崇正會會員的祖籍地；而多數成員都來自臺灣桃園、苗栗和新竹，來自大陸以及其他客家地區的客家人幾乎都沒有入會，且日本各地共 5 個崇正會的會員組成皆以臺灣人為主。此一現象或許可以從職業類型的集中度作為初步觀察。根據崇正組織的紀錄顯示，多數居住在日本的客家人多從事醫師、教授、技術者、貿易商與飲食店等工作（緒方修 2002：200），可推測日治時期有不少受過教育的客家人赴日留學，而隨著學成後進入當地醫療、學術或服務等產業體系定居於日本。

## （二）日本客家崇正會的發展與現況

日本第一個以「客家」為名的社團組織始於 1945 年，因戰後陷入窮困的客家人為了相互團結而創建了客家公會，是為迄今為止所能確認的最早期的客屬社團（河合洋尚 2015）。然而，客家公會僅維持 10 年左右，就因會長空缺而停擺，經丘念臺的極力遊說，於 1963 年成立第二個客屬社團——東京崇正公會。<sup>4</sup> 除東

<sup>2</sup> 根據日本總務省的資料，截至 2024 年底，日本總人口約為 1 億 2,400 萬人；有關客家人口數的不完全統計資料，可參見陳運棟（1978）、河合洋尚（2013）及張維安（2015）、潘美玲等（2015）之研究。根據非連續區間的統計數據，客家人口數約介於 4 千至 2 萬之間，筆者遂採取此區間作為研究標的。

<sup>3</sup> 河合洋尚（2013、2015）指出，日本學者自 19 世紀末以來對海外客家研究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不過對於定居在日本國內的客家人幾乎不聞不問。其猜測係殖民政政策之故，向來有「偏重海外、輕視國內」的傾向；二是客家人口過少故本身不具吸引力。

<sup>4</sup> 林開忠、利亮時（2015：239）指出，林利章曾解釋，因「客家」或「客屬」在日本沒有甚麼人會知道，且容易被視為少數民族而遭歧視，故採用在日文具崇高意涵的「崇正」一詞；另選用「公會」而非「崇正會」，則是取其「奉公」「公共」之意；另河合洋尚（2015：130）同樣根據林利章的紀錄指出，此一命名是參考以香港為主的、世界性客屬社團崇正會的事例，最終決定稱為「東京崇正會」。

京之外，陸續成立名古屋崇正會（1965）、西日本崇正會（1967）、關西崇正會（1968）、橫濱崇正公會（1911）、北海道崇正會（1998）、九州崇正會（1998）、東北崇正會（1998）與沖繩崇正會（1998）等地方組織，並於 1969 年設立全日本性的客家組織「日本崇正總會」，於 1999 年更名為「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然而，隨著組織整併、會員高齡化與後繼乏人，目前僅有「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旗下的關東、關西、名古屋與沖繩 4 地崇正會，以及獨立運作的東京崇正會，共 5 個組織仍持續運作。

根據林開忠、利亮時（2015）的研究，日本崇正組織具有幾項特色。首先，移民日本的客家人多為醫師、教師等專業人士，基本上是以「仕」為組成的社會，故無須透過組織炫耀財富或表彰社會地位；此外，由於沒有大量的勞動階層，亦不需要太多的公共財支應會員從生到死的福利與照顧，因此維持一種俱樂部的型態，屬於非法人的組織團體。由此可見，日本各地的崇正組織具有高度彈性，其主要宗旨在於聯絡感情、傳承客家文化，故自創立以來便秉持「不問政治、不問宗教、不問國籍」的原則。然而，正因運作模式靈活，組織內部在權利與義務亦相對薄弱，再加上長期缺乏穩定的組織運作機制與專屬的會館空間，會務多半依賴個人或單一家族支撐，導致日本客家崇正會難以長久經營。事實上，由於崇正會成員普遍年事已高，缺乏新血加入，除了維繫情感外，組織亦面臨語言與文化斷層的挑戰。因此，如何促進傳承、強化認同感，已成為維繫日本客家崇正會運作的重要課題。

為強化成員連結、營造社群歸屬感與提供情報交流平臺為宗旨，日本客家崇正組織定期舉辦懇親大會，並積極參與世界客屬總會之活動，於 1980 年更曾擔任世界客屬總會的主辦單位。2001 年臺灣客家委員會成立後，亦開始接觸有關客家語言與文化保存及推廣的相關政策；其後，自 2009 年前後起，日本崇正組織開始憑藉成員的專業背景，積極投入各類公共領域的實踐。飯島典子等（2021：80）等指出，以目前來說，在日本有不少雖然不會講客家話，但仍具有客家認同，並參加這些活動的人們。可見儘管客語已不再構成日本客家社群互動的核心，但它仍扮演著凝聚客家認同的重要角色，其功能也從組織內部的鄉情聯繫逐步拓展至對外的文化推廣。

#### 四、日本客家崇正組織的蒐藏實踐

日本客家崇正組織一方面規劃舉辦各類學術講座，另一方面深入參與臺日文化交流活動，此舉不僅促進社會參與，更進一步成為客家文化推廣的重要途徑，逐步累積並擴展客家文化保存與傳承的集體意識。其中，由駐日代表處臺灣文化

中心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共同主辦的「臺灣文化光點計畫」，意外成為日客家崇正組織蒐藏的開端，進而開啟一系列的展演行動。

### (一) 客家前進民博

「臺灣文化光點計畫」始於 2013 年，係由文化部駐外文化據點透過與海外專業藝文機構及重點大學建立夥伴關係，以推動臺灣文化之國際交流。在日本地區，該計畫先後與東京藝術大學、愛知大學、讀賣新聞文化中心及民博等單位簽署合作備忘錄，攜手辦理多元且深入的臺灣文化主題活動。<sup>5</sup> 民博於 2014 年藉由該計畫與臺灣原住民社群展開合作與研究，成果廣受好評。遂於隔年（2015）延續該合作模式，並以臺灣客家文化為主題，舉辦一系列的活動，詳列如下。

表1 系列活動日期與內容表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7 月 11 日	「學習臺灣客家文化」講座	演講 1：「客家文化與臺灣——從 1970 至 80 年代的調查經驗談起」 講者：渡邊欣雄（國學院大學教授、日本文化人類學會前會長） 演講 2：「客家人的跨國婚姻實況——串連臺灣與印尼的姻緣」 講者：橫田祥子（滋賀縣立大學助理教授） 演講 3：「臺灣客家的住居——聚落形態與居住文化」 講者：長野真紀（神戶藝術工科大学助理教授）
9 月 6 日	「日本的客家人——歷史與現況」	一、座談會 1：「日本客家的足跡——回溯客家人在日本的七十年歷史」 講者：周子秋（日本關東崇正會會長） 2：「我與客家」 講者：謝珠榮（前寶塚歌劇團演員） 二、展示會
9 月 23 日	臺灣電影欣賞會	從電影認識臺灣：《一八九五》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日本民族學博物館官方網站

<sup>5</sup> 詳見文化部文化新聞〈日本系列文化活動於東京揭開序幕〉（2013）、〈文化部日本地區臺灣文化光點計畫正式展開 促進國際藝術文化交流〉（2013）、〈文化光點計畫 原住民工藝家在日發光〉（2014）、〈「臺灣文化光點」照亮日本大阪 客家文化系列活動陸續登場〉（2015）。

值得注意的是，該系列活動原先規劃以講座、座談會與電影欣賞會等形式進行，民博遂邀請多位專家學者與在日的客家人，共同參與並分享對客家文化的觀點與經驗。其中，時任日本關東崇正會會長的周子秋受邀於座談會發言。會前，周氏主動向民博研究員河合洋尚提出展示實物的建議：「能不能把我現在有的簡單的東西做一個擺佈，順便給人家看。……。我的意思是說，這個客家很難解釋，有實物、有東西給人家看，人家就會有一個印象」。<sup>6</sup>事實上，周氏與河合洋尚於關東崇正會相識時，便曾提出在民博策劃小型展示的構想，惟因不符合民博的相關標準而未獲採納。<sup>7</sup>然而，藉由此次座談會所提供的契機，得以重新提交予民博，並最終獲得積極回應。

為此，原定僅半日的座談會增設了展示空間，展品主要由周子秋提供，內容涵蓋日本崇正會歷年相關資料、新竹義民廟所刊印之褒忠匾額複製品、日本客家研究的相關出版品，以及描繪客庄生活的畫作等，其召集崇正會相關成員共同籌備，利用現場的桌子與展示架自由陳列其珍藏的客家文物，民博則提供部分的館藏作為補充並協力完成佈展；此外，宣傳海報特別選用由余貴美子提供的 1920 年代客家婦女盛裝照作為視覺意象，<sup>8</sup>反映出在日客家社群對自身文化傳承與投入的積極性。從當日的活動照片與相關紀錄可發現，現場氣氛熱絡，座無虛席。除崇正會成員踴躍參與外，也吸引不少對客家文化感興趣的學者與一般民眾前來觀展。座談會期間聽眾亦積極參與討論與提問，可見日本社會對客家文化的濃厚興趣。值得一提的是，「展示會」當日原擬以提供料理作為文化互動媒介，惟因博物館禁止飲食規定而未能實現，此一構想遂於後續的展覽中轉化落實，透過呈現菜單與料理製作影片，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以「美食」傳遞與感官客家文化的互動初衷（詳見後「共作展覽的實踐」）。

由於「展示會」屬座談會之附屬活動，故展期僅為期一日、規模亦相對簡單，但卻是在非官方的主導下，由日本客家社群自行籌劃，並首度透過展覽形式向日本社會呈現客家文化；適逢日本客家創社 70 週年，此舉更具有紀念意義。<sup>9</sup>周氏以「客家前進民博」形容此一行動，並強調：「會後客家資料寄贈該館（民博），

6 筆者訪談於 2024 年 11 月 28 日。

7 參見周子秋《百年仰望：客家人在日本》之記錄（2023：346）；另，根據筆者於 2024 年 11 月 26 日對河合洋尚的訪談，民博除常設展外，另規劃兩處空間用於特展與企劃展，其展覽內容須符合既定的規模設定與預算條件。由於周氏當時提出的展覽構想未能滿足該空間規劃及資源配置的標準，故未能付諸實行。

8 余貴美子（Yo Kimiko, 1956 年生）為日本女演員，祖籍臺灣客家。其父於二戰前自臺灣移居日本，余氏亦曾於 NHK《家庭歷史》節目中尋根，並與桃園余姓宗親會建立聯繫。近年積極參與客家文化推廣，並以客家身份為榮。其高度公共能見度使其成為在日客家社群的重要象徵人物。

9 日本客家創社 70 週年係以戰後 1945 年崇正公會之創立為起點，至 2015 年屆滿 70 周年。

使客家能進入日本國立民博，在該館永久保存，這是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日本關東崇正會及日本關西崇正會最大的期待」。<sup>10</sup>此一期待，實源自周氏參觀民博時的深刻體悟，他曾向筆者透露該館蒐藏來自世界各地民族的日常器物與服飾約 35 萬件，但卻幾乎不見客家文化之身影。基於此，周氏期盼客家文物得以納入民博常設展，以更完整呈現客家文化的多元樣貌，因此萌生捐贈客家文物的構想。

## （二）捐獻客家文物運動

「捐獻客家文物運動」為周子秋自 2020 年起，因應協助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客發中心）籌備展覽而展開的一系列文物蒐藏行動之自稱。事實上，周氏對客家文物保存的意識，始於 2006 年東京崇正公會會長交接時的資料散佚事件，以及第二任會長邱進福辭世後珍藏文物無人接手而被棄置深感惋惜，<sup>11</sup>故早於 2014 年便開始著手蒐集日本客家文物，並多方打聽適合的保管單位，惟始終未果。因此前述「展示會」結束後不久，周氏便返臺參與「2015 全球客家發展會議」，並分享其在日本舉辦「展示會」的成果，亦多次公開主張設立「世界客家博物館」的必要性。他參考世界各地較具規模的客家博物館與相關機構，提出博物館應依各大洲區分展示內容，並透過各地客家團體的支援與協助，蒐集當地歷史資料與文物，推動跨國展示交流，並以民博的組織架構為藍本，建議博物館應設立「客家研究大院」以培育客家研究與文化的推廣，進一步強化臺灣客家的國際連結。<sup>12</sup>

至 2019 年 12 月，客家委員會所屬的客發中心來電聯繫，表示其自 2017 與日本民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三方簽署學術研究合作交流協定（以下簡稱三方協定），預定 2020 年於臺灣客家文化館舉辦臺日客家主題的巡迴展覽《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sup>13</sup>並邀請周氏協助提供展品，因而成為啟動「捐獻客家文物運動」的契機。周氏接獲邀請後隨即展開行動，向日本客家崇正會成員寄發 20 餘封徵集函與贈與同意書，相關信件與附件如下所示。

10 參見周子秋（2023：318）《百年仰望：客家人在日本》之記錄。

11 參見周子秋（2020）《世界客家雜誌》第 20 期。

12 詳見周子秋（2023）《百年仰望：客家人在日本》與（2018）《世界客家雜誌》第 12 期。

13 參見何金樑等（2020）〈日本與臺灣客家巡迴展構思〉與河合洋尚（2020）〈「臺灣客家と日本」巡迴展をめぐる構想〉。

敬啟者

時值冬寒各先進事業順利、闔家平安為喜為賀。

茲、1945年「日本客家會」成立至今，已近75年。由各先進之努力，在異國發揚客家文化，前仆後續【繼】、繼承先賢遺志持續不斷。

客委會，擬於2020年7月15日起，在苗栗客家文化中心（國家設施），舉辦「日本與臺灣客家國際展示會」，誠盼各先進提供展示資料，照片、實物寄贈或借出（捐送者添好同封寄贈同意書），同實物寄書住址、以便於2020年3月中旬，苗栗客家文化中心負責人來日時轉交。

日本關東崇正會：〒156-0043 東京都世田谷區松原2-11-5

TEL/FAX：03-3325-2166

kantosusei@yahoo.com.jp

感謝大家的協力。

執行長：周子秋

代表：周子秋、陳荊芳、城年德、安田伊佐男、林利章、賴石傳

日本關東崇正會：溫勝治、劉禎士、羅世光、劉文玲

日本關西崇正會：劉宏成、中山明惠

名古屋崇正會：陳文雄，方蓉聆

沖繩崇正會：林國源、張健全

PS：\*為求作業效力，及返品作業，請以贈呈或以COPY寄贈。

#### 贈與同意書

- 1、即日起，該贈與物、所有權利委任給「○○○」（捐獻機構）。贈與人放棄所有權利。
- 2、我不會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或索賠。
- 3、我將自己擁有的東西捐贈給「\_\_\_\_\_」（捐獻機構）。若該物品有作展覽時，必須使用原贈與人名字。
- 4、捐贈品由「\_\_\_\_\_」轉送與客家文化園區、大學或博物館作為最終保存處，本同意書具相同效力。
- 5、贈與物品內容名明細表

署名\_\_\_\_\_（）年（）月（）日

表Table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_\_\_\_\_（寄件人Donor）、hereby certificate that I am willing to donate my belongings to \_\_\_\_\_（受取機構、人）。

署名signature_____：簽名、印 ( )年year ( )月month ( )日day			
贈與品名內容Gifts Content：  品名說明書添付Gifts content 有yes 無no 照片 有yes 無no (不足時、別紙When insufficient Pin paper)			
品名來歷 Gifts comes			
贈與者氏名 Donor name		性別 gender	
住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職業 Professional		贈與年月日 Gift Date	

抄錄自周子秋《百年仰望—客家人在日本》

由於「贈與同意書」為周氏自行擬製，故相關措辭與所附條件在法律效力上仍顯模糊，但這仍是一項具深遠意義，不僅展現出對客家文化的深厚認同感，更懷抱將之介紹予日本社會的重要舉措。根據周氏回憶，活動初期進展並不順利，未能立即引起廣泛回響。為此，他開始積極奔走，以行動取代言語，期望號召更多旅日客家人參與。在他善用在地人脈推動與遊說之下，逐漸獲得日本社群的響應，並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果，其蒐藏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是與日本崇正組織相關的文物：包括懇親大會相關的紀念刊物、會員名簿、《客家之聲》等。其二屬日本崇正會成員的私人文物：如余貴美子、謝珠榮的家族生活照、海報劇照、年賀狀等。最後為客家相關的歷史文物：例如首部以客家方言撰寫的《中華舊禮俗》<sup>14</sup>、旅日棒球選手吳明捷的紀念獎盃、服裝、球棒、隊旗等。<sup>15</sup>

### (三) 行動者

Hardy (2013: 80) 指出，物件與場所被廣泛認為具有喚起回憶的能力；而透過具體物質形式來保存記憶的各種嘗試，則深植於歐洲各地的諸多實踐之中——無論是個人、社群、博物館或其他文化參與者透過「物件收集、保留歷史場所、策展展覽、紀念儀式或地方導覽」等方式，來保存與再現過去記憶的日常文化實踐。由此可知，記憶的保存並非單純仰賴物件本身的意義，而有賴於行動者在特

14 為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版本。

15 參見《世界客家雜誌》第12期(2018)與《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展示專輯》(2022)。

定歷史與文化脈絡下的主動參與及詮釋。更重要的是，這些實踐通常依賴具備經驗與知識的引導者，如地方耆老、策展人或文化工作者，協助行動者理解物件與場所所承載的記憶意涵，並促成感知與情感上的連結。

在「客家前進民博」至「捐獻客家文物運動」的推動過程中，不難發現周子秋不僅是一位積極的行動者，更是社群內部的關鍵引導者。實際上，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曾試圖訪談其他成員，卻多次被建議「請教周先生」而婉拒，顯示他作為年紀最長、參與資歷最深的成員，已在文化實踐中承擔起歷史經驗與文化脈絡之詮釋與協商責任。在蒐藏行動中，周子秋雖然是以個人熱情與號召力推動工作，引領其他成員投入蒐藏與展示相關活動，但若無在地日本客家社群的回應與支持，捐獻客家文物運動亦難以展開，客發中心所規劃的海外客家研究網絡與資源整合也不可能順利推進。

由此可見，文化實踐並非單一且均質的表達，而是由多元且分散的行動構成，並透過具代表性的個人加以協商與再現，進而連結社群記憶、整合資源，並形塑展示的敘事框架。是故，文化的延續往往仰賴特定行動者的主動介入與持續實踐，但其成果並非一人所能成就，而是在社群成員的支持與共同參與下逐步累積與深化。在下一節探討與民博合作過程中，亦可見此種參與結構的具體展現。

## 五、日本客家崇正組織與民博

儘管客發中心的展覽並未釋出由日本客家社群自主詮釋的場域，但在其協助下，原本散佈日本各地、零碎保存的客家文物得以陸續發掘，並重新置入社會脈絡之中延續集體記憶。不過臺日客家主題的首場巡迴展覽《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展出期間適逢新冠疫情（Covid-19），加上三方協定於 2020 年底期滿終止，原負責此一計畫的民博研究員河合洋尚亦轉任至東京都立大學，導致原預定於日本舉辦的巡迴展計畫暫時擱置，未能如期推進。但由於河合與周子秋彼此熟識，且雙方對展覽皆抱有共同的期待。故河合轉任東京都立大學後不久，便主動聯繫民博，提議再次推動「臺日客家交流展」。民博方面亦表達支持與肯定，最終促成此計畫於 2023 年初重新啟動，延續日本客家主題展覽的規劃與實踐。

### （一）共作展覽的實踐

臺日客家第二場巡迴展覽「客家與日本：海外華人編織的另一部東亞關係史」（以下簡稱「客家與日本」），由日本民博主辦、臺灣客發中心協辦，策展人為河合洋尚，並由其率領東京都立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室與相關研究團隊負責展覽

之研究規劃。值得注意的是，河合洋尚自展覽籌備初期即邀請周子秋參與，從資料蒐集、內容設計、田野調查至研究討論會等各階段，皆與之密切合作。籌備期間，周氏多次根據自身經驗提出建言，並積極串聯日本崇正會相關組織投入展覽籌備工作。整體而言可分為三種形式說明：

### 1. 參與研究

為充實展示內容，研究團隊多次進行田野調查，<sup>16</sup> 並與在地社群展開交流。由於沖繩地區的客家資料稀少，團隊於 2023 年 2 月 1 日前往沖繩博物館考察，並拜訪沖繩大學緒方修教授、沖繩崇正會前會長等人，請教當地的歷史背景與脈絡。此外，於同年 9 月 2 日，團隊亦與崇正會成員共同前往新竹芎林國小，尋找鄧雨賢相關資料，並洽談文物借展事宜。<sup>17</sup>

### 2. 共創知識

除參與研究實作外，社群亦參與知識生產的過程，如展覽相關的出版刊物《客家與日本：鮮為人知的日本與中華圈交流史》一書，由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全球地域研究特別研究班成員執筆，撰寫期間多次與關東、關西、沖繩等地的崇正會成員舉行研究會，並由周氏協助監修內容，審視書中是否存在對日本客家的誤解與謬誤，最終由河合統整全書內容完成出版。<sup>18</sup>

### 3. 協作式策展

本部分主要涵蓋了物件的提供、展品選擇與詮釋、以及教育推廣活動的策劃等層面。由於民博原有之客家藏品數量有限，且多來自中國大陸客家地區，缺乏反映在日客家經驗的相關資料，因此在展覽規劃初期即面臨「移居日本的客家人」相關脈絡呈現不足的問題。為此，周子秋捐贈了大量文物資料，除了與崇正會相關的歷史文獻、客家研究書籍外，更包含多項個人藏品，豐富了展覽基礎。此外，考量民博過往展示以實體物件為主，文書資料相對較難吸引觀眾，周氏亦與關東崇正會會長溫勝治協調，促成一整套表演用舞獅（包含舞獅、服裝、銅鑼與大鼓）之捐贈。<sup>19</sup> 民博則依此設計為可供觀眾互動敲擊的展區，據筆者田野觀察，此區為展覽中頗受觀眾歡迎的部分。此外，崇正會成員也積極參與展覽內容規劃，提出應納入日本客家社群生活中的三項重要活動作為展示主題，包含年會、徐福祭

16 本調查範圍限於崇正會成員參與之活動，不包括專家學者所另行進行之實地考察行程。

17 參見《世界客家雜誌》第 40 期、42 期。

18 參見《客家と日本—知られざる日本と中華圏の交流史》（2024：94）。

19 參見《世界客家雜誌》第 42 期。

與返鄉祭祖。這些建議最終被納入展覽內容，充分體現日本客家組織所欲傳達之生活經驗。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客家組織的會務主要由男性主導，雖然 2003 年曾短暫成立「全日本臺灣客家婦女會」，惟於 2009 年解散。不過自 2014 年起，關西崇正會成員中山明惠主動發起「客家料理教室」，藉由料理實作推廣客家文化，逐漸成為日本社會認識客家的重要途徑之一。正因如此，男性成員特別提議將「客家料理」納入本次展覽，初步構想為以食物模型呈現。然而，「客家料理教室」成員進一步建議增加料理製作過程之影片，期望完整呈現如切菜手法、調味方式等細節，以加深觀眾印象。此一構想獲得民博支持，並協助完成影片之錄製與剪輯。料理教室成員除與策展人河合共同討論菜單內容外，亦親自準備食材、擔任示範者，並撰寫食譜，現場印製提供觀眾索取。

從上述的實踐可見，儘管展覽的敘事主軸仍由專業研究者掌握，但透過社群參與研究、知識共創與協作式策展等實踐，日本客家社群不再只是被動的資料提供者或研究對象，而是被視為具備知識的主體（knowledge holders），並作為研究與展覽的共同參與者與合作夥伴（co-researchers）。周氏特別向筆者強調此次展覽「官民同等、公平對待」，顯示展覽團隊打破傳統由上而下的結構，建立一種以互信與平等為基礎的合作關係。此一立場不僅回應了當代博物館轉向社群參與的趨勢，也強化社群在文化詮釋與展示實踐中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 （二）共作展示的互動與協商

日本民博作為戰後日本對全球文化進行系統性研究與展示的民族學機構，自成立以來便致力於貫徹文化相對主義，通過比較研究實踐文化應該在自身脈絡中被理解的理念，反映全球文化的多樣性與流動性。然而在實踐過程中，民博亦逐漸意識到自 1977 年開館以來，其常設展未曾大幅度變更，長期停留於再現「他者文化」的視角，難以反映當前文化的多元樣態。為此，民博於 2008 年開始啟動常設展示的整體更新工程，致力於強化世界各地文化與日本社會之間的關聯，並將展示軸線延伸至當代社會，促使觀眾以「同時代人」的視角產生共鳴與共感。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民博積極回應後殖民的批判與反思，採取「展示方」與「被展示方」共同合作的展示方式（吉田憲司 2013），此一轉向不僅強化了各社群對自身文化的理解，亦促進與各社群之間的理解與對話。

日本民博所採取的合作式實踐模式，深刻影響了館內與周邊研究人員的研究取徑與學術關懷。例如「客家與日本」展覽的策展人河合洋尚表示，他原以景觀人類學為專長，但自投入博物館實務工作以來，逐漸拓展了研究視野，開始關注公共人類學的相關議題，嘗試與日本客家社群建立夥伴關係，共同參與學術研究，推動知識的公共化與普及。憑藉雙方長期的互動與合作，他不僅深化了對客家社群歷史與文化的理解，更在交流中激發出新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向。<sup>20</sup>此一經驗顯示，社群相關的研究往往根植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對話與實踐歷程，其知識生成於多方交織與協作下的共享成果，為持續斷流動、累積與重構的過程，而非研究者單方面所能建構。

值得注意的是，在策展實踐過程中，策展團隊和參與的客家社群間曾出現意見分歧。舉例來說，關於哪些料理能夠代表「客家菜」，各成員觀點各異。客家料理教室成員李安琪表示，因其自身為臺灣人，認為「客家小炒」更能體現臺灣地區客家飲食的特色。然而，「客家與日本」展覽旨在呈現跨地域的客家文化樣貌，進而勾勒更為廣義的「華僑·華人」視野，因此在與策展人河合洋尚討論後，最終選擇以中國南方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客家社群常見的「釀豆腐」作為展示菜色之一。事實上，在籌備過程中，李氏意外想起童年時期父親曾為其烹調此道料理的經驗，進而引發對父親與客庄生活的情感連結與記憶再現，也促使她重新省思自身的文化傳承經驗，並加深對客家文化多樣性的理解與認同。<sup>21</sup>

除了代表性客家料理的選擇存在分歧外，社群成員所提供之文物必須經策展人與民博內部核定，故對展出的文物有所擇揀。顯見雙方對展覽的想像並不完全一致。社群成員希望放入所有的文物，以完整呈現其生活記憶與文化面貌；策展人著重於建構符合客家整體脈絡的策展敘事；民博則須顧及展場空間限制與藏品維護條件等實務考量。此一分歧不僅顯示雙方在展覽構想上的差異，亦呈現策展權力與資源分配上的不對等關係——客家社群雖欲完整呈現自身文化記憶，但最終展品與敘事的選擇，仍須在博物館所設的專業框架與制度性限制下協商與妥協。

由此可知，儘管博物館致力於建構讓不同觀眾與多元社群互動與對話的文化交流場域，以彰顯其作為公共空間的社會性與價值多樣性，但在實際運作中，仍無可避免地面對來自不同歷史背景與文化經驗的社群，彼此觀點可能存在差異甚至衝突。正如 Clifford (1997) 所提出的「接觸區」概念，博物館可視為異質群體相遇、協商與交涉的場域，在此空間中，文化、知識與敘事的權力分配並非均衡，群體間需透過互動與協商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聲音與記憶表達。

20 筆者訪談於 2024 年 11 月 26 日。

21 筆者訪談於 2024 年 3 月 17 日。

## 六、結語

本文運用博物館民族誌作為方法，旨在探討日本客家社群如何於博物館體系中展現其文化實踐的能動性。研究顯示，多數客家後裔已不再將客家身份視為主要認同的背景，傳統以血緣與鄉緣為基礎的懇親會參與人數，已有逐年下降之趨勢，<sup>22</sup> 故若僅依賴懇親會作為維繫日本客家社群凝聚的場域，恐難以持續發揮其功能，亦不利於客家認同意識的延續與再建構。因此，日本客家社群逐步轉向以舉辦文化活動為策略，嘗試重塑社群的向心力並增加能見度。然而，由於日本客家崇正組織缺乏固定會館與常設辦公空間，且未能有系統地保存其活動相關的資料，與文物往往面臨散佚風險。此情況促使成員逐漸意識到保存的重要性，並積極尋求具有象徵意義與實踐功能的空間——博物館——作為社群認同的承載場域，以延續客家文化的傳承。

然而，日本客家社群在面對文化保存議題時，並非僅依賴外部機構的介入或政策扶持，而是透過成員積極的文化實踐與主動參與，推動自身在博物館場域中的位置與能見度，展現出對文化表述權的訴求與協商能力。在本文所探討的個案中，周氏作為推動社群行動的關鍵引導者，促成後續的蒐藏與展示行動，開啟了日本客家社群文化實踐的新篇章。同時，社群與博物館之間的合作關係，無論是否提供社群自主詮釋的明確空間，或採取相對開放的參與機制，其本質仍奠基於非對等的權力結構之上。正因如此，社群的參與呈現出高度策略性，透過回應不同需求與機會的同時，主動提出合作、應邀參展、以及協助尋找展品等。這些行動不僅為文化實踐創造新的契機，也在尋找物件與敘事素材的過程中，持續推動社群內部對文化再現方式的探索與實踐，進而促成成員共同參與自身歷史與文化的書寫。

與此同時，日本客家社群不僅在自身文化實踐中展現能動性，也在蒐藏與展示的互動過程中發揮影響力。首先，在蒐藏運作上，社群成員主動提供文物與相關資料，補充館方以往較少涉及的範疇，豐富了館藏的多樣性；其二，在展覽策劃與敘事建構中，融入社群自身觀點並參與官方敘事的協商與調整，使展覽內容更能反映社群的文化認同與需求；其三，在文化再現與權力協商上，特展挑戰了常設展中對客家文化的有限視角，凸顯日本客家的在地性與多元性；其四，在知識連結與合作方面，社群成為博物館與其他研究機構之間的橋樑，促進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與跨域交流；最後，在教育推廣與觀眾互動中，社群透過展覽參與不

22 根據筆者於 2024 年 11 月 28 日進行訪談，以及於 2025 年 3 月 29 日參與第 52 屆日本客家關西崇正會懇親大會期間之觀察，皆有受訪者提及參與人數呈逐年減少之趨勢。

僅展現博物館對在地文化多樣性的關懷，也提升了自身在公共領域的能見度，使大眾對其文化有更多認識與尊重，並在獲得外部肯定的同時，促使成員更加積極投入文化保存與傳承的實踐。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指出，日本客家社群在博物館場域中的文化實踐，不僅展現高度的能動性，也凸顯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況下，仍可透過社群運用多元策略進行協商與重構，進一步保存並傳承客家文化。此一研究有助於深化對海外客家文化延續機制的理解，並進一步揭示博物館在社群參與知識生產過程，其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謝誌：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誠摯感謝眾人於筆者日本田野調查期間所提供的協助與照顧。特別感謝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會長周子秋先生的指導，及各位受訪者慷慨分享寶貴經驗與資料，使研究內容更為充實。另感謝匿名審查人提出的精闢意見與建設性建議，促使本文更加完善。

## 參考文獻

- 王嵩山，1992，〈博物館民族誌的概念與方法兼及臺灣人類學博物館的初步檢討〉。  
《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4：76~109。
- 文化部，2013，〈日本系列文化活動於東京揭開序幕〉。《文化部文化新聞》，1  
月 14 日。[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05&s=49212](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05&s=49212)，取用日期：  
2025 年 6 月 10 日。
- 文化部，2013，〈文化部日本地區臺灣文化光點計畫正式展開 促進國際藝術文  
化交流〉。《文化部文化新聞》，11 月 4 日。[https://www.moc.gov.tw/News\\_](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05&s=48933)  
[Content.aspx?n=105&s=48933](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05&s=48933)，取用日期：2025 年 6 月 10 日。
- 文化部，2014，〈文化光點計畫 原住民工藝家在日發光〉。《文化部文化新聞》，  
3 月 1 日。[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05&s=49636](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05&s=49636)，取用日期：  
2025 年 6 月 10 日。
- 文化部，2015，〈「臺灣文化光點」照亮日本大阪 客家文化系列活動陸續登  
場〉。《文化部文化新聞》，7 月 17 日。[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05&s=50575)  
[aspx?n=105&s=50575](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05&s=50575)，取用日期：2025 年 6 月 10 日。
- 吉田憲司，2013，〈フォーラムとしてのミュージアム、その後〉。民博通信  
140：2-7。
- 何金樑、河合洋尚 編，2022，《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展示專輯》。  
苗栗縣：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何金樑、洪登欽、徐芳智，2020，〈日本與臺灣客家巡迴展構思〉。頁 361-378，  
收錄於《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大  
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 周子秋，2018，〈「世界臺灣客家博物館」的提案〉。《世界客家雜誌》12：4-7。  
臺北市：世界客家雜誌有限公司。
- 周子秋，2020，〈日本關東崇正會正推動「捐獻客家文物」運動正在推展〉。《世  
界客家雜誌》20：4-7。臺北市：世界客家雜誌有限公司。
- 周子秋，2020，〈「捐獻客家文物運動」的成果中間報告〉。《世界客家雜誌》  
21：26-28。臺北市：世界客家雜誌有限公司。
- 周子秋，2023，〈介紹研究日本客家的新生力〉。《世界客家雜誌》40：9-13。臺北市：  
世界客家雜誌有限公司。
- 周子秋，2023，〈日本客家前進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世界客家雜誌》42：  
11-14。臺北市：世界客家雜誌有限公司。
- 周子秋，2023，《百年仰望：客家人在日本》。臺北市：世界客家出版社出版。

- 周子秋監修、河合洋尚編，2024，《客家と日本—知られざる日本と中華圏の交流史》。東京：風響社。
- 林開忠、利亮時，2015，〈日本客高之社群組織與公共參與〉。頁 229-267，收錄於《東瀛客蹤：日本客家研究初探》。苗栗縣：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河合洋尚，2013，《日本客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百年的軌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河合洋尚，2015，〈日本客家的歷史與族群性初探〉。頁 117-144，收錄於《東瀛客蹤：日本客家研究初探》。苗栗縣：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河合洋尚，2020，〈「臺灣客家と日本」巡回展をめぐる構想〉。頁 379-380，收錄於《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 施添福，2014，〈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3：1-110。
- 陳運棟，1978，《客家人》。臺北市：聯亞出版。
- 張維安，2015，〈日本客家研究導論〉。頁 1-20，收錄於《東瀛客蹤：日本客家研究初探》。苗栗縣：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飯島典子、河合洋尚、小林宏至，2021，《客家：歷史・文化・印象》。苗栗縣：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臺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 緒方修，2002，《世院客家大会を行く》。東京：現代書館。
- 潘美玲、范以欣、張翰璧，2015，〈日本客家移民與人口分析〉。頁 143-186，收錄於《東瀛客蹤：日本客家研究初探》。苗栗縣：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Clifford, James, 2019, 《路徑：20 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張滌之、林徐達譯。苗栗縣：桂冠。
-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dy, Matthew. 2013. "Feeling the Past: Embodiment, Place and Nostalgia." In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 edited by Sharon Macdonald, 180 – 203. London: Routledge.
- Macdonald, Sharon. 2009.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London: Routledge.
- Nora, Pierre, 2012, 《記憶所繫之處》。戴麗娟譯。臺北：行人出版社。
- Simon, Nina. 2010.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Santa Cruz, Calif.: Museum 2.0.